

語言與社會期中作業

廖永賦

2018-05-23

8

幸福路上

《幸福路上》以閩南語作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語言，我覺得相當符合當時社會的情況。電影中的地點設定為臺北，臺北作為一個移居者匯集的地區，生活中的語言使用應以當時最流通的語言為主（溝通指數最高），而閩南語應為當時民間最流通的語言。

電影中另一個有趣的語言現象即為主角小琪的語言。《幸福路上》以小琪的故事作為主幹，而小琪的故事其實就是《幸福路上》導演宋欣穎自身的成長故事（“宋欣穎,” 2018, 2018, 2018, 2018）。根據導演的受訪，馬上就可以回答電影中這個「奇怪」的語言現象—為何生長在父母皆使用閩南語的家庭，小琪仍然較常使用中文（漢語）？電影忠實地呈現了導演宋欣穎自身語言使用的情況：

我的外婆是個有原住民血統、吃檳榔的外婆，可是我家裡都講台語，而事實上我自己又不太會講（台語）。等我到了美國，看到他們的移民家庭裡，父母都使用母語，除了中文還有西班牙語、和甚至非洲語等等，可是小孩都用英文回答他們，我覺得這很有趣，怎麼會跟我們家一樣？（“釀專訪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：「與其一直抱怨這個環境，為什麼不想辦法改變它？」,” 2018）

小琪的現象或許並非罕見。例如，研究顯示通常同儕相對於父母對使用何種語言有較大的影響力 [at standford2008]，或許在當時的國語政策下，同儕間（在學校）的溝通語言變成漢語為主，造成小琪日後以漢語作為主要語言。另一可能的原因為性別。以我所知的例子，1. 我外公為外省籍的老兵，不會講閩南語，但其常不在家。我外婆為本省籍，講閩南語¹。因此可合理推測我母親幼時，家庭應該以閩南語為主。然我母親雖會講閩南語，但不算是最流利的那種（少了點母語使用者那種流暢的口音，某些詞彙也不清楚）。2. 這學期我聽中文系的張麗麗老師提及她自身的狀況：與我母親相同，老師也是在外省（父）—本省閩南（母）家庭長大的。老師說她以及妹妹不會閩南語，但她的兄弟皆會流利的閩南語。

¹有趣的是，我外婆跟我（還有跟我目前8歲的表弟）說話時，會自動改成使用漢語。而我小時候在外婆家住過一段時間，那時正好是我開始學會講話的時間。不知道這是否與我低落的閩南語程度有關。

語言與思維的關係相當複雜。縱使最極端版本的 Sapir-Whorf Hypothesis—語言決定論 (Linguistic determinism) 被認為是錯誤的，語言仍有可能以其他更細微的方式影響思維。依據思維相對於語言運作的時機，可將之區分為「說話前的思考 (Thinking for speaking)」、「運用語言思考 (Thinking with language)」、「語言對思考的後續影響 (Thinking after language)」(Wolff & Holmes, 2010)。以下簡單各舉一例：

1. 說話前的思考：有些語將動作的方式 (manner) 表示於動詞，而將動作的方向 (path) 表示於其它詞類 (如副詞)，英語、中文即為這種語言 (「run out」、「跑出去」)。另一些語言比較重視動作的方向 (path) 而將其用於動詞，將動作的方式 (manner) 表示於其它詞類，如法語、日語、希臘語。這些不同語言上的結構差異，造成其使用者開始說話前，注意力關注的焦點不同。例如，希臘語使用者比起英語使用者更傾向注意動作的方向 (path) (Papafragou, Hulbert, & Trueswell, 2008)。
2. 運用語言的思考：運用語言的思考最顯著的一個例子是「精確」的數量。人類以及許多其他動物，天生就對極小的數量 (小於 3 或 4) 的數量有絕對的概念；對大量的數量有約略的概念；但對精確的「數字」，如「33」，是後天習得的。明確的證據指出精確的數字概念與語言之間的關聯 (Dehaene, Spelke, Pinel, Stanescu, & Tsivkin, 1999; Frank, Everett, Fedorenko, & Gibson, 2008; E. S. Spelke & Tsivkin, 2001)。沒有語言，或語言中不具有數字系統，人類將無法以精確的數量進行思考。
3. 語言對思考的後續影響：前述兩種語言與思維之間的關係直接與語言有所關聯，即思考本身是為了表達，或是透過語言進行思考，語言似乎直接參與了思考歷程。「語言對思考的後續影響」指的則是不涉及語言本身的思考：在長期使用特定語言下，是否會對思維產生影響。其中一項支持的證據來自語言中是否舉有單複數。日語、中文等語言的名詞，沒有單數或複數型態的差別；英語則必須指出名詞為單數或複數。因此，英語使用者可能會傾向將注意力集中在「個體」的特質，而日語或中文的使用者則可能傾向將注意力集中在「共同」的特質。例如，英語使用者可能較注意椅子的形狀，而日語、中文使用者則較注意椅子的材質。此假設受到 Li, Dunham, & Carey (2009) 的研究支持。

這些研究證據顯示語言以不同種方式影響思維的可能。然關於 Daniel Everett 對於 Pirahã 人的想法：「他們的語言沒有時態，他們真正活在當下之中」，似乎隱含更複雜的因素。首先，我同意這句話的後半段：人類在進入大規模社會後，先是曆法，接著時鐘的發明似乎改變人類對於時間的概念，大家開始擔心時間的流逝，並且開始「預約未來」(排行事曆、約會時間等)。Pirahã 人生活在沒有現代時間概念的社會中，且其生活方式也無須擔心是否有事情未完成，因此其「活在當下」顯得相當合理。然我認為難以使用「他們的語言沒有時態」作為理

由。從 Pirahã 人的文化可以很明顯地發現其許多部份皆支持著 Pirahã 人「活在當下」，例如簡單的物質技術（所以不須從事大規模的生產）、從事漁獵採集（所以比起農耕更加不勞力密集）、沒有強烈的物質需求（只向 Everett 要求一些簡單的物資）等。文化本身即是強而有力的解釋，能夠說明 Pirahã 人「活在當下」。忽略這些文化因素而單以語言的結構作為解釋顯得相當不合理。

參考資料

Dehaene, S., Spelke, E., Pinel, P., Stanescu, R., & Tsivkin, S. (1999). Sources of Mathematical Thinking: Behavioral and Brain-Imaging Evidence. *Science*, 284(5416), 970. <https://doi.org/10.1126/science.284.5416.970>

Frank, M. C., Everett, D. L., Fedorenko, E., & Gibson, E. (2008). Number as a cognitive technology: Evidence from Pirahã language and cognition. *Cognition*, 108(3), 819–824.

Li, P., Dunham, Y., & Carey, S. (2009). Of Substance: The Nature of Language Effects on Entity Construal. *Cognitive Psychology*, 58(4), 487–524. <https://doi.org/10.1016/j.cogpsych.2008.12.001>

Papafragou, A., Hulbert, J., & Trueswell, J. (2008). Does language guide event perception? Evidence from eye movements. *Cognition*, 108(1), 155–184. <https://doi.org/10.1016/j.cognition.2008.02.007>

Spelke, E. S., & Tsivkin, S. (2001). Language and number: A bilingual training study. *Cognition*, 78(1), 45–88. [https://doi.org/10.1016/S0010-0277\(00\)00108-6](https://doi.org/10.1016/S0010-0277(00)00108-6)

Wolff, P., & Holmes, K. J. (2010). Linguistic relativity. *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: Cognitive Science*, 2(3), 253–265. <https://doi.org/10.1002/wcs.104>

宋欣穎. (2018). 基百科，自由的百科全 .

專訪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（上）：力爭上游了，然後呢？－上報 / 生活. (2018, January). http://www.upmedia.mg/news_info.php?SerialNo=29595.

專訪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（下）：我們應該共同記得一些事情－上報 / 生活. (2018, January). https://www.upmedia.mg/news_info.php?SerialNo=32864.

釀專訪幸福路上導演宋欣穎：「與其一直抱怨這個環境，為什麼不想辦法改變它？」. (2018, January). <http://sosreader.com/n/article/5a8ea24deceaedde8df7dcc4>.